

DOI:10.16515/j.cnki.32-1745/c.2020.01.011

审美的离合:《过故人庄》与《游山西村》之比较

雷晶晶

(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1)

摘要:孟浩然的《过故人庄》与陆游的《游山西村》同属农村记游题材的诗歌,二者表现出相同的线性结构,使得记游式动态的叙抒具有完整流畅的艺术效果。受创作主体生平志意的影响,《过故人庄》中,“故人庄”成为理想的“桃花源”式隐逸生活的诗意图表达,《游山西村》中,“山西村”则是现实中诗人暂时获得休憩的精神园地,农村题材诗歌在不同主体情意的灌注下具有了不同的文化形态。受诗歌语言形式的限制,二者在意象与情趣的融合程度上亦呈现出“情趣淹没意象”与“意象遮蔽情趣”的差异,从而显示出疏朗阔达与厚朴沉着的境界分别。

关键词:《过故人庄》;《游山西村》;结构;意象;情趣;农村文化形态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1X(2020)01-0055-04

孟浩然、陆游是唐、宋两朝诗歌创作巨擘,由于历史条件和生平经历的差异,二人在情感状态、思想状况以及审美趣尚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区别。然而,时隔约五个世纪的两位诗人,在农村记游题材的诗歌中,却表现出鲜明的互文性特征。譬如,孟浩然《过故人庄》与陆游《游山西村》在结构、取象及意图等方面,都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但是,由于诗歌自身生命力的要求,二者在意象和情趣上也显现着深刻的个性差异。本文拟从诗歌语言形式角度展开精微细致的修辞分析,通过分析、比较二者在结构、取象、意图和情趣上的离合,以期对同类农村记游题材诗歌有进一步的探索,对不同文人在相同时题材叙抒的差异上有进一步的发微,并求教方家。

一、线性结构:时间艺术的感性显现

艺术作品的内容和结构往往受到创作题材的规定和限制。《过故人庄》与《游山西村》同属农村记游题材诗歌,均表现出鲜明的线性结构。所谓线性结构,是指诗歌的叙抒依据事件的先后发展顺序,在诗人的视角下呈直线型渐次展开,空间随着时间的顺延依次实现转换,叙抒在事件的行进中一气

呵成。

从诗题上看,“过故人庄”与“游山西村”具有强烈的互文性特征,即二者在内涵或形式上有内在的逻辑关联。从语言形式上看,二者同为动宾结构,且语意近似。“过”和“游”都预示着主体从一个(常居的、较为熟悉的)环境区域,走向另一个新的(暂居的、相对陌生的)环境区域,最终又需回到原来的常居环境当中。“过故人庄”与“游山西村”两个诗题的语言形式和结构意义相似,为诗歌创作活动在思维上划定了大致相同的范围。值得一提的是,正是暂停的、相对陌生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刺激着诗人的创作神经,为其带来新鲜的素材,激发诗人的创作灵感。诗人视线停留的地方,就是事物刺激其日常钝感神经、诗性发生、诗心纵横之处。这就为这两首诗题近似的诗歌留下了个性创作的空间。实际上,二者在语象、语意和语势上有诸多叠合,换言之,其从形式到内容都有高度的相似性。那么,为什么诗人面对不同的材料,即鄂西北的田庄与浙西北的三山乡,却有近乎同质化的叙述?这正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从结构上看,《过故人庄》与《游山西村》皆从首联农庄主人邀客起始:“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1]^[15],“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2]。“邀”与“留”两个动词共同陈述了创作主体的活动原

收稿日期:2020-02-29

作者简介:雷晶晶(1995-),女,陕西渭南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点,同时又呼应诗题所隐含的暂居。颔联概画拜望的村庄况貌:“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1]115};“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2]。自然环境的状貌在颔联中显示出来。颈联具写农人的活动:“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1]115};“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2]。前者是主体零距离参与的闲话农事图,后者是主体保持距离静观的箫鼓春社图。一静一动,折射出创作主体不同的审美取向。尾联“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1]115}和“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2]都表达了将要再次归来的愿望。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过故人庄》与《游山西村》二者结构上高度契合。类似的结构反映了人类情思的相通、暗合。情思的相通在诗歌史上并不鲜见。究其原因,在于客观的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中国古代农村,自然形态的变化和社会形态的发展十分缓慢,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自然社会条件下,人们的情感思想发生偶合是很自然的事情,这是人类情思相通、暗合的客观原因。而从深层次上来看,情思的暗合又实在是受制于“公共话语资源的有限甚至匮乏”^[3]。公共话语是指“文学言说活动中可资取用的语言与题材等资源”^[3]。“诗人们在相同的诗语、诗材中获取创作资源,就难免存在诗句暗合的可能”^[3]。因而在这类以农村记游为题材的诗歌中,既是“记游”,自然首先要交代其起因,继而写村庄的景物与人事,最后以还将再来的心愿表示对友人邀请、招待的感谢,表达对农村生活的喜欢,从而既实现了诗歌的交际功能,也承载了言情言志的自我表现的要求。

诗歌是时间的艺术。“因为诗的媒介是在时间上相承续的语言,动作正是在时间直线上先后承续的。”^{[4]29}因而,线性结构最契合诗歌艺术表达的本质要求。线性结构使得诗歌能够充分发挥其时间性的艺术特质,伴随着时间的线性流动,叙事和抒情起伏开阔,线索明晰,首尾自足,自然顺畅。值得一提的是,诗歌的线性结构借重和选择不同的物象来表达诗人的态度和情感,以有限的语言材料之间的相互映射来暗示作家的体验和认识。因此,不同的物象构成线性结构上的辐散点,并持有和线性结构类似的情感基调,形式结构与情绪结构互相支持。从结构上的类似也可以发现,五言律诗《过故人庄》和七言律诗《游山西村》在叙抒功能上也相类,换言之,诗歌在形式因素上的差别并不影响二者情感内容上的交通。

二、农村形态:不同主体的文化需求

诗歌在反映诗人审美趣尚和精神追求的同时,也是诗人凭借艺术解脱人生的过程。《过故人庄》与《游山西村》以游记的形式和结构,通过对农村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构画,营造了恬淡浑朴、简率自足的田园生活氛围。诗人在创作诗歌的过程中,陈述了自己的情感倾向和精神意向,这是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诗歌的表达范式。而文人创制此类诗歌的动机和文化意义值得关注。

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古代诗歌创作自《诗经》时代就已开始。在《诗经》时代,十五国风中的农村生活图景是在“男女相从而歌”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文化背景下创造出来的。“男女相从而歌”,说明创作主体的群众性;“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诗歌的节奏契合了主体的情感心理节奏。以诗歌表达情思意向,是诗歌的天然使命和主体的天然要求,因而诗中的农村形态具有写实、再现的倾向。《诗经》后较有名气的文人,除晋时的陶渊明外,基本上没有人长期切身地从事过农业生产活动。或者说,《诗经》后的文人在创作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诗歌时,并不是以农人的身份而是以他者的角度有选择性地观照农村生活。总体上看,根据创作动机的不同,文人的“选择性观照”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出于补察时政或道德教化的目的而创作的有关农村的诗歌,譬如白居易的《观刈麦》^[5]、李绅的《悯农》^[6]。这类诗歌往往以旁观者角度再现农事,侧重写农事的苦辛,反映苦乐不均的社会状况,隐含着创作主体的政治意图。从对象的角度出发来看,此类诗是为他人立言。另一类则是站在诗人自己的立场,虚构其农村见闻和感受。这类诗歌往往侧重表现创作主体理想中的农村生活形态,本文所探讨的两首诗歌都属于此类。这类诗歌的文化意义往往与诗人的生平志意密切相关。

《过故人庄》是孟浩然隐居鹿门山时期应邀拜访有感而作。诗人淡然写出由“绿树”“青山”围合的村庄,自然环境的天然“封闭”使得友人村庄远离车马尘嚣,而其中的人、物、事也无外乎“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之类,无关于荣禄利名。“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的愿望,则是循着自然的节奏而发生的人事活动。“自然”是《过故人庄》最突出的特征,这种“自然无为”的旨趣与孟浩然隐逸的人生选择无疑志

同道合、相互印鉴。因此可以说,《过故人庄》是孟浩然隐逸生活的另一种形式,是其“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1][203]}隐居生活的补充。这种农村生活没有弃绝红尘,不问耕织,而是置身于尘世伦理之中,躬耕自足,不知秦汉,而能自我修炼。这种生活形态类似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无独有偶,陶渊明在《归园田居》其二中也有与“把酒话桑麻”相似的表述:“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7]众所周知,弃官归田园是陶潜身处乱世对自由生活的选择,孟浩然也无疑将生活的情思寄托在此处。因而,《过故人庄》是孟浩然理想的隐逸生活的诗意呈现。

《游山西村》创作于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初春,时陆游正罢官闲居在山阴(浙江绍兴)。在主人的盛邀之下,陆游感受到了乡民的淳朴。颔联历来被认为是描写人生命理转换的绝响,这不能说与陆游自身的经历没有关系。陆游深受忠君爱国思想的熏陶,在危如累卵的南宋成长,他立志杀敌收复山河,然而受主和投降派的打压,导致他此次离官归山。愤懑的情绪在游山西村途中被悄然置换,其根因在于,诗人发现了自然景象与人生命运之间所存在的某种巧合关联。“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明花暗又一村”,这是绝处逢生的欣喜,是死而后生的勇毅,于是他再一次对人生燃起了更大的信心。在山西村中,诗人捕捉到了祭祀活动的热闹,农人朴拙的意趣,他希望在闲暇时间,能乘月常游。无疑,游山西村是陆游“闲时”消遣的一种选择,是穷途中的安慰力量来源。不同于孟浩然将全部的人生意趣投放于“故人庄”上,陆游的“山西村”更像是其人生的加油站、缓冲区,农村生活对不同的个体具有了不同的意义。然而,其共性都在于,诗人通过对农村生活的选择性观照而获得了精神慰藉,并在静观这种慰藉中,诗人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和挣扎,并在观照这种被投映的自我的有限中,获得对生存困境的安抚,对生存方向的进一步明确,此即由形象得解脱。

三、诗歌境界:意象与情趣的交织融合

诗歌的演变过程就是不断寻求新的生存路径的过程。寻找新的生存路径,就是寻找新的视角和材料、营构新的意象和情趣的过程。朱光潜在《诗论》中认为,“诗的境界是情趣与意象的融合”^{[4][48]}。不同的境界是不同诗歌艺术实质的感性显现。《过故人庄》与《游山西村》题材相类,结构相近,然而这

两者却显现了不同的境界。尽管五言律诗《过故人庄》与七言律诗《游山西村》的叙抒功能相类,但由于语言形式的限制,二者仍表现出一定的差异。语言形式限制了对同一材料的描写,使其显现出详略之间的差别,影响了诗人情趣与意象之间的融合程度。五言律诗中的材料在七言律诗中有了更进一步的修饰和拓展,从而使得相同的材料能够表现出不同的情趣。如表1中所列出的“酒”被拓展为“腊酒浑”,“绿树”被置换成“柳暗花明”,“村”被修饰为“又一村”。从语言的修辞上说,两个文本具有很强的指涉性。但细读文本,其材料的同质,对情趣的塑造影响甚微。换言之,二者在情趣和意境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游山西村》中的“腊酒浑”点出了喝酒的时节以及酒的性质,细节再现了农户的生活,也暗示了农户同腊酒一样浑朴的性格,与下一句的“足鸡豚”并置对照,衬托出好客热情的人文环境。同时,相对密集具体的修饰辞,也使得《游山西村》更加贴近现实中的农家氛围,带出一片厚朴的意境。与《过故人庄》中一字带起的“酒”相较,后者更接近诗人的主观表现。“把酒话桑麻”,疏朗阔达的胸次氤氲于杯酒相接的谈笑之间。颔联中对村舍的勾画,《过故人庄》使用横向平面铺展的叙抒技法,让“绿树”与“青山”围绕的“村”庄直接跃然纸上,是印象式的;而《游山西村》则使用纵向遮隐延伸的呈现方式,在“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的流动中,牵引出置于崎岖道路前方的村落,是描写式的。前者带来疏落简淡的境界,后者则表现出幽隐厚拙的意蕴(表1)。

表1 《过故人庄》与《游山西村》相似材料的对比

题目	对比				
《过故人庄》	田家	鸡黍	酒	青山	绿树 村
《游山西村》	农家	鸡豚	腊酒浑	山重	柳暗花明 又一村

如上所述,七言律诗相较于五言律诗能较多展开对材料的描绘,更适宜再现对象,与此同时,受分散对象不同性质的影响,也相对容易分散主体情意的加持,情趣往往躲藏在意象背后,意象被堆砌在台前。五言律诗则由于语言形式的限制,不得不较多裁剪对象的性质,在创作主体对材料有意识、有指向性地剪裁、筛选、变形、放大中,诗人的主观情趣较多地被表现出来。但这并不是说七言律诗《游山西村》在对客观对象的表达中更少地灌注了诗人的主观情趣,而是说五言律诗的裁剪和放大程度更大,运用主观意志更多,而灌注于表现对象中的主观情趣反倒

萧散铺平在对象整体之中,审美感受偏重整体的统一,又因为其情趣平均的分散而显得淡然和阔大。由于形式因素的影响,导致诗人对同一材料(意象)有了不一的感知(情趣)。《过故人庄》表现出疏朗阔大的情趣,而《游山西村》则表现出厚朴沉着的意趣。

应该说明的是,诗歌语言形式对情趣意境的营建确有一定的影响,但这并不否定创作主体在征服语言媒介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也就是说,无论是五言诗歌还是七言诗歌,其意境的最终呈现并不完全由诗歌形式决定,更多的是受到诗人的个性气质、情感思想等影响,而诗人选择什么样的语言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诗心,也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形式与内容恰到好处的结合,即语言材料的形式恰好能够表现主体情意,则是判断一首诗艺术成就高低的标准。

综上所述,《过故人庄》与《游山西村》受农村记游题材影响,表现出相近的线性结构,其契合了诗歌为时间艺术的实质,使得动态的叙抒具有完整流畅的艺术效果。由于孟浩然、陆游生平志意的游离,二者在艺术解脱人生上表现出一定分歧。农村生活是孟浩然另一种理想的、永恒的隐逸生活形态,对陆游来说,则是现实中获得暂时的安抚和慰藉的精神地

带。由于形式因素的影响,意象和情趣的融合在两首诗中也显示出了差异。《过故人庄》中情趣大于意象,意象淹没于情趣之中,侧重诗人的主观世界,表现出疏朗阔达的境界;《游山西村》中意象大于情趣,情趣隐藏于意象背后,侧重表现意象的形态,表现出浑朴沉着的境界。这两者之间明显的区别,也说明了不同创作心理需求对构建多样农村形态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 [1] 孟浩然. 孟浩然诗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 [2] 陆游. 剑南诗稿[M]. 长沙:岳麓书社, 1998:62
- [3] 朱光潜. 诗论[M].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100
- [4] 焦亚东. 中国古典诗歌的互文性研究[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8
- [5] 白居易. 白居易全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1163
- [6] 薛塘退士. 唐诗三百首[M].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3:51
- [7] 陶渊明. 陶渊明集[M]. 长沙:岳麓书社, 2019:74

(责任编辑:刘 鑫)

Aesthetic Separation and Cooperation: A Comparison between *Visiting an Old Friend's Farm-house* and *A Trip to Mountain West Village*

LEI Jing-jing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zhong 723001, China)

Abstract: *Visiting an Old Friend's Farm-house* written by Meng Haoran and *A Trip to Mountain West Village* by Lu You all belong to the poetry about writing rural travels notes, both of them show the same linear structure, which make the travel-style dynamic narration have a complete and smooth artistic effect. Influenced by the author's life ambition and will, in the poem of *Visiting an Old Friend's Farm-house*, "an Old Friend's Farm-house" has become an ideal poetic expression of reclusive life in "Peach Blossom Garden" style. In the poem of *A Trip to Mountain West Village*, the village of Mountain West is a spiritual garden for the poet to have a temporary rest in reality. Rural theme poetry has different cultural forms under the infusion of different subjective feelings.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the language form of poetry, the two also sh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un overwhelming image" and "image overshadowing interest" in the degree of fusion between imagery and interest, thus showing the realm difference between broadness and calmness.

Key words: *Visiting an Old Friend's Farm-house*; *A Trip to Mountain West Village*; structure; image; interest; rural cultural form